

试论元明清《一统志》的思想内涵 及纂修方式*

吕文利

提 要：中国一直是多元发展的，如何“一体化”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大问题。以少数民族统治天下的元朝，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困境，以中国传统“大一统”思想治理国家，以《一统志》纂修为标志，建构正统的合法性，并力图把新纳入版图地区通过编纂志书的方式合法化。《一统志》与其他官修史书一起，通过官方书写的方式，确立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“大一统”的意识形态，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跃升。明清两朝对“大一统”亦有自觉追求，分别纂修《一统志》。《一统志》纂修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官方编修，场馆、经费、人员有保障，且由最高统治者钦定，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质量。

关键词：《一统志》 “大一统”思想 国家治理

中华政治文化源远流长，“天下观”构成古代国人对天下的认知，应该说，“大一统”观和“夷夏”观是在“天下观”的基础上，由历代儒学学者根据不同的情势而构建出来的，因此，“天下观”是一体，而“大一统”和“夷夏”观念则好比是硬币的两面，它们构成了“天下观”的全部认知，缺一不可。^①相比于严苛的以种族、文化划分的“夷夏”观，开放包容的“大一统”观念更符合中国古代多元一体发展的脉络，“大一统”思想在维护国家统一、传承优秀文化方面功不可没，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。以《一统志》等大型文化工程的纂修为标志，“大一统”思想在元、明、清三代受到特别重视，成为国家主要意识形态。

一 元明清编纂《一统志》的“大一统”思想

从方志学的角度来看，元朝是中国古代第一次以“大一统志”为名来编纂志书的朝代，虽然“大一统”思想早已有之。^②为什么元朝第一个以官方书写的方式编纂“大一统志”，为什么明清两代都有“大一统志”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公元960年，赵匡胤经黄袍加身后，建立宋朝，但是宋朝一直没有达到汉唐的“大一统”规模，在它的北方，始终有辽、西夏等其他政权存在，所以为了维护其正统性，宋朝格外强调华夷之辨。作为“夷”的元朝建立之后，在思想上是很突兀的。如果说成吉思汗可能没有“大一

*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“清代国家统一史”项目（项目编号：LSYZD2019004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参见吕文利：《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3年第3期。

② “大一统”思想先秦时期就已有之。《春秋公羊传》载：“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西汉董仲舒认为：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”他进一步构建了政治一统、思想一统和天下一统的理论。随着思想一统的儒学成为正统思想，政治一统和天下一统作为意识形态也被历代王朝所追求。（吕文利：《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3年第3期）

统”思想，但是到了创立元朝的忽必烈时期，已经有了这个思想。忽必烈建立元朝后，自我地位十分明确，既要当草原上的大汗，也要当中原的皇帝，而尤为重要，在忽必烈时期，与元朝接壤的都是蒙古贵族建立的汗国，所以他必须试着从中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。因此，以建立来自儒家经典《易经》的“大元”为标志，忽必烈开始接受儒家的“大一统”观念，以正统王朝的统绪自居，并以天下一统为目标。^①而以“大一统”为正统合法性来源，不但需要武功的实现，也需要文治加以实现，这正是《大元大一统志》纂修的主要动机。《大元大一统志》的纂修，具有重要意义，“不仅推动了方志的定型化和规范化发展，而且为明清两代纂修一统志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蓝本。尤其是《大元大一统志凡例》的制定，成为封建朝廷制定的第一个修志凡例，以元代行政区域路州县为纲目，体现了国家一统的政治理念，在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”^②。

到了明朝，虽然朱元璋以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作为讨伐元朝的旗号，在制度上也有很多创新，力图摆脱蒙元旧制，但是明朝的典章制度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沿袭了元朝旧制，包括军户世袭制，官手工业与匠籍制等^③，在文化上则继续以“一统志”为名编纂《大明一统志》。众所周知，明朝疆域要远远小于元朝，但明朝的正统合法性偏偏绕不过去这个大一统理论，所以在《大明一统志图叙》中，对于元朝这样评价：“元氏以夷狄入住华夏，内立中书省一，以领腹里诸路，外立行中书省十，以领天下诸路。然其地西北虽过于前，而东南岛夷未尽附。”一方面说元朝是以“夷狄”入主中原，以孔子狭隘的以生产方式和文明程度区别“华夷”的“夷夏观”理路来质疑其统治合法性，同时还以孟子较为开放包容的以“大一统”为标准的“夷夏观”来衡量，发现“东南岛夷未尽附”，元朝也未实现“大一统”的目标。^④所以明朝就有了底气：“惟我皇明诞膺天命，统一华夷，幅员之广，东尽辽左，西极流沙，南越海表，北抵沙漠，四极八荒，靡不来庭。而我皇明一统之盛，冠乎古今者，垂之万世有足征云。”^⑤

很显然，明朝虽然明知疆域要比元朝小，但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，声称自己的“大一统”“冠乎古今”，这就说明纂修《大明一统志》的目的主要在于意识形态的建构，营造明朝为大一统王朝的话语氛围，以为其政权建立合法性基础。

延续这一逻辑，清朝也不例外，在清朝文字狱的血雨腥风里，清朝皇帝更加强调“大一统”观念，试图以“大一统”理论来瓦解“华夷之辨”理论，标志性事件就是雍正帝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刊刻。实际上，在中国古代，大体有3种评判正统与否的价值体系，一为以孔子严格的“华夷之辨”为代表的种族评判价值体系；二为以孟子“大一统”为代表的空间评判价值体系；

① 据《元史》卷4《世祖一》记载，忽必烈在即位诏书中就有“建极体元，与民更始”之语。建元中统后，又诏告天下：“朕获纘旧服，载扩丕图，稽列圣之洪规，讲前代之定制。建元表岁，示人君万世之传；纪时书王，见天下一家之义。法《春秋》之正始，体大《易》之乾元。”取法儒家经典《春秋》之“大一统”观念，以《易经》阐发宇宙本源的“大哉乾元”为义建立“大元”，不但说明忽必烈在观念上接受了儒家“大一统”思想，而且还充分说明其在实践层面上具有疆域一统的雄心。

② 张英聘：《论〈大明一统志〉的编修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2004年第4期。

③ 具体可参见李治安：《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1年第5期。

④ 参见韩东育：《清朝对“非汉世界”的“大中华”表达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4年第4期。

⑤ 参见《大明一统志图叙》，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，1977年影印本，第54—56页。

三位以邹衍五德终始说为代表的时间评判价值体系。^①五德终始说在宋代以后逐渐退出市场，而“孔子和孟子的这两种夷夏观，在后世不断被用来作为理论来源，每个时代、每个人都根据现实实践而进行选择，从而争论不休，到清朝雍正皇帝与曾静的争辩，作了一次系统总结和彻底清算”^②。

为“大一统”话语体系建设，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纂修工程，其中包括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《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等，以这种方式不但昭告了蒙古、回部、西藏已经纳入清朝的版图，而且以“大一统”话语来强调清朝的合法性。^③

清朝有3次或纂修或重修《大清一统志》：第一部修于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成书于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历时58年，共356卷，是为康熙《大清一统志》，纂修此书的目的即是“以昭大一统之盛”，而尤为注意的是，该书是由礼部奉命开馆纂修，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。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早在康熙十一年就有人上疏请求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建议各省以《河南通志》《陕西通志》为样板纂修各省通志，并以各省通志为基础，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，这一建议经部议准后施行。^④但这一计划竟延缓了十几年。十几年后，清廷一边催促各省纂修通志并上报，一边启动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计划。康熙二十五年五月，康熙帝诏谕《一统志》馆之总裁官：

朕惟古帝王宅中图治，总览万方，因天文以纪星野，因地利以兆疆域，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。故《禹贡》五服，《职方》九州，纪于典书，千载可睹。朕纘绍丕基，抚兹方夏，恢我土宇，达于遐方，惟是疆域错纷，幅员辽阔，万里之远，念切堂阶，其间风气群分，民情类别，不有缀录，何以周知？爰敕所司，肇开馆局，网罗文献，质订图经，将荟萃成书，以著一代之巨典，名曰《大清一统志》。^⑤

要旨还是在“大一统”理念，但是此时并未达到实践上的“一统”。待到乾隆朝时，疆域版图扩大，新疆等地都纳入版图，续修《大清一统志》又提上议事日程。乾隆朝续修《大清一统志》从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续修，成书于乾隆五十年年底，共424卷（另有目录2卷），是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。^⑥

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该书仅以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为限的缺点显现，此后的资料未加入进去，所以又议重修《大清一统志》，于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始修，至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书成，历时31年，全书560卷。该书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为限，称为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。道光帝在《御制大清一统志序》里面开篇就说：“我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，增式廓而大一统者，于今

① 参见吕文利：《清廷的正统理论及文化建设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0年第2期；并见吕文利：《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——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9年第2期。

② 吕文利：《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——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9年第2期。

③ 参见吕文利：《清廷的正统理论及文化建设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0年第2期。

④ 参见薛柱斗纂修：《新校天津卫志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北地方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1968年影印本，第141号，第20页。

⑤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26，“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影印本，第5册，第342—343页。

⑥ 参见王大文：《乾隆续修〈大清一统志〉研究三题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2015年第6期。

二百年。”^①

清朝三次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是继承元、明两代有关“大一统”的思想，承接元、明有关“大一统”的话语体系，以此证明清朝是中国王朝序列里的一个正统王朝。

所以，“一统志”是元、明、清三朝层累地建构起来的关于正统的话语体系，其目的不仅仅是建构正统的合法性，还有试图把新纳入版图的地區通过书写志书的方式合法化的目的，也就是说，元、明、清三朝不仅仅是以武功、卡伦、鄂博来确定边界，还通过书写来确定边界和认同，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。

二 《一统志》的纂修方式

《一统志》作为重要的官方文献，是受到统治者特别重视的，其在实践过程中，大体形成了完备的、统一的体裁体例，要设专馆修史，经皇帝御览后最终定稿。

（一）统一体裁体例

编纂史志首先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就是体裁体例问题，这是历代纂修志书者首要考虑的问题，现在纂修史志也不例外，为解决编纂的体裁体例问题，当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纂修《清史》之初，还专门召开大型会议研讨。

当然中国古代纂修《一统志》的特点主要是用“志”的写法来写，这个似乎无需讨论，“志”的最大特点即是简明、客观，“述而不论”，所以可信用度较高，可为信史。《康熙起居注》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十二月初四日写道：“礼部纂修《一统志》，请给桌饭银两。其纂修处，应交与内阁。”当时康熙帝的回答很值得玩味，他说：“纂修《明史》俱撰文字，故多费时日。若修《实录》《会典》以及此书，不过誊录，并非撰文，岂宜迟缓？凡纂修各馆俱宜定限。”^②

由此可以看出，康熙帝所理解的《大清一统志》的纂修似乎只是“剪刀加浆糊”的结合，并不用“撰文”，这也道出了“志”的最大特点。

但是《一统志》的体例只是以“志”来统，实际上还有图、表、传等体裁，所以，历代《一统志》的纂写人员都很重视体例问题。如雍正十一年（1746），总裁官方苞在《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》中云：“明《统志》为世所诟病久矣，然视其书，尚似一人所条次；譬为巨室，千门万户，各执斧斤任其目巧，而无规矩绳墨以一之可乎？是书所难，莫若建置沿革，山川古迹；振奇矜能者，大率博引以为富，又不能辨其出入离合，而有所折衷，是以重复讹舛抵牾之病纷然而难理。不知辞尚体要，地志非类书之比也，所尚者简明，而杂冗则愈晦。然简明非可强而能，必识之明，心之专，遍于奥赜之中，曲得其次序，而后辞可约焉。其博引而无所折衷，乃无识而畏难，苟且以自便之术耳。故体例不一，犹农之无畔也；博引以为富，而无所折衷，犹耕而弗耨也。且或博焉，或约焉，即各致其美，而于体例已不一矣。”^③

方苞强调的是体例统一问题。以嘉庆重修《大清一统志》为例，实际上以各省为经，京师以外，全国分为直隶、盛京、江苏、安徽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浙江、江西、湖

^① 《御制大清一统志序》，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卷1，“四库丛刊续编”，上海书店，1984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1册，第1页。

^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：《康熙起居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标点本，第2册，第1408页。

^③ 《方苞集》卷6《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标点本，上册，第180页。

北、湖南、四川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新疆、乌里雅苏台、蒙古计 22 统部，并青海、西藏等地。

以志、图、表等体裁为纬，计分为图、表、疆域、分野、建制沿革、形势、风俗、城池、学校、户口、田赋、税课、职官、山川、古迹、关隘、津梁、堤堰、陵墓、祠庙、寺观、名宦、人物、流寓、烈女、仙释、土产等。

如此一来，经纬分明，一目了然。

(二) 设专馆修史，经皇帝御览定稿

元、明、清三朝比较重视《一统志》的编修，力图通过官方书写来达成意识形态的统一。清朝对官书极为重视，都要经皇帝御览后定稿；重要的史书一般都要设馆编纂。康熙朝特设“一统志馆”纂修《大清一统志》，乾隆朝先是在方略馆纂修，后改为国史馆。

以乾隆朝开国史馆为例，可以看出纂修官书的流程。

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因重修国史列传，重开国史馆，大学士、忠勇公傅恒等奏开馆的一些事宜，有：

1. 开馆需房屋一所，以为办事藏贮书籍之地。现有东华门内原修《会典》之空房，请咨行内务府拨给，俟馆竣之日，仍行文交还；
2. 馆中需用纸张，行文户部支领，其桌凳等项，并行各该衙门取用；
3. 恭查从前国史馆纂修等官，俱由内阁、翰林院官员内派委，此次所需人员，视从前应当酌减；
4. 馆中所有桌饭工食银两俱照例按月于户部支领；
5. 馆中行文各处，俱用内阁典籍印信，以昭凭信。^①

除了有场馆、人员和经费的保障外，编纂期限还有严格限定，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六月二十六日奉旨：

《兰州纪略》着予本年办竣；

《皇朝通典》《通志》着予限三年，于乾隆五十年即行全竣，其余各书俱着照单依限赶办。

计有：

《开国方略》，共 32 卷，现拟于本年七月内进起，计期于四十八年四月完竣；

《宗室王公表传》，共 10 卷，现拟于本年十月内进起，计期于四十八年三月完竣；

《蒙古王公表传》，已进过 4 卷，未进约 28 卷，计期于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；

《大清一统志》，已进过 297 卷，未进约 60 卷，计期于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；

《盛京通志》，已进过 30 卷，未进约 70 卷，计期于四十八年七月完竣；

《职官表》，已进过 16 卷，未进约 50 卷，计期于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；

《兰州纪略》，已进过 4 卷，未进约 16 卷，计期于四十八年四月完竣；

《日下旧闻考》，已进过 166 卷，未进约 20 卷，计期于本年十二月完竣；

《明唐桂二王本末》，已办竣，现在加案覆进，即送武英殿写入《四库全书》；

^① 《清国史馆奏稿》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，2004 年，第 1 册，第 93—94 页。

《契丹国志》，现在赶办，拟于九月内全部进呈；

《满洲源流考》，已进过 270 卷，未进约 7 卷，计期于本年十一月完竣；

《续通志》，已进过 278 卷，未进约 430 卷，计期于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；

《皇朝通典》《通志》，此二书甫经接办，尚未进起，卷帙浩繁，约于五十二年夏季完竣。^①

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史馆修史的特点：

一是官方修史，在场馆、经费上有保障；二是专人修史；三是所修史书均需进呈，须经过皇帝钦定；四是限定一定的期限，虽然大多史书未按期限完稿，不得不一次次上奏请求宽限日期。

另外，在史料来源上，元、明、清三朝《一统志》大多来源于各地方志，如《大清一统志》，是先有各地方志，在此基础上才编纂了《大清一统志》，但各地方志和其他一些官书主要取材于档案，如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《平定金川方略》《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《西域图志》《盛京通志》等。所以这就构成了《大清一统志》→地方志等官书→档案三级史料来源体制。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。

小 结

总之，元朝开始以《一统志》为名来纂修全国的地理总志，其目的不仅仅是建构正统的合法性，还有试图把新纳入版图地区通过书写志书的方式合法化的目的，与其他官修史书一起，通过官方书写的方式，确立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“大一统”的意识形态。其纂修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官方修史，在场馆、经费上有保障，而且是专人修史，最高统治者要钦定，保障了史书的质量。这些经验都是我们在今后的史书编纂时需要注意的。当然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中华文化一直是多元发展的，以少数民族统治天下的元朝，认识到了国家治理的困境，以中国古代传统的“大一统”思想治理国家，并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，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跃升，明、清两朝对“大一统”亦有自觉的追求，这是所谓“新元史”“新清史”所无法否认的关键问题。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，对“大一统”思想的坚持，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，元、明、清时期是重要的发展阶段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^① 《清国史馆奏稿》，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内阁抄出福隆安奏折，第2册，第637—638页。